



中国 传奇

从特区 到自贸区

谢国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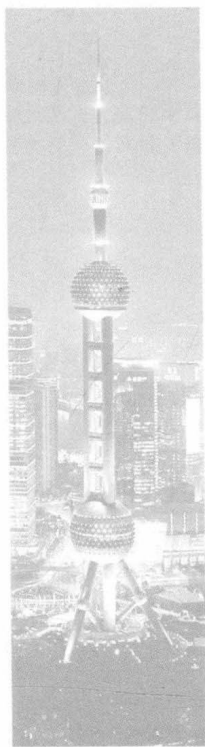
以支点撬动整体的
改革开放，
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重要经验之一。



中国 传奇

从特区
到自贸区

谢国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奇:从特区到自贸区/谢国平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ISBN 978-7-208-15723-1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9458 号

责任编辑 熊 捷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中国传奇:从特区到自贸区

谢国平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0.5
插 页 4
字 数 471,000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23-1/I·1807
定 价 78.00 元

引言 | 前夜 / 001

第一章 | “大逃港” / 003

结束了百年来的战争、动乱，中国人极度渴望和平的新生活。

可是这种狂欢带来的幸福感很快消失，没有多久，守卫边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现许多老百姓却要离开新生的深圳，逃向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第二章 | 震惊差距 / 012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978年起，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国门，以开放解除了闭关自守的僵硬体制。

第三章 | 南国春早 / 026

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被关押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习仲勋流泪了。临走时，习仲勋给了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尚方宝剑”：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过去“文革”前允许做的，“文革”后自己不准做的，你现在可以恢复，只要法律没有规定说是犯法的，你大胆地去试。

第四章 | 一锤定音 / 043

1978年，北京高层领导纷纷走出国门，为中外巨大差距震惊，有了“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南国春早，广东地方领导已经行动起来，袁庚第一个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建立蛇口工业区，吴南生大胆地建议在汕头试点。

最终改革的合力聚焦到了南国边陲小镇，邓小平一锤定音，叫经济特区。

第五章 | 大搞快搞 / 079

在1979年的春天，南方的改革者们内心充满了阳光，激情在血液里突奔着，他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对于改革者，那真是一个“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时代。

在《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困扰着深圳，也困扰着中央政府的偷渡现象突然消失了，藏在深圳梧桐山中、深圳湾红树林里准备逃港的人群不见了！

第六章 | 改革试管 / 103

1979年7月12日，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在深圳湾的蛇口炸响，炮声隆隆，大地晃动。“蛇口是中国的土地，引进外资，办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出让土地、劳动力资源，让外资获利，是搞新殖民主义”，因而也就是丧权辱国的“卖国主义”——“三顶黑帽”压过来，真使人吃惊，使袁庚难受。

第七章 | 被逼无奈 / 123

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往上长。大厦建设者幽默地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深圳首先砸烂了“铁饭碗”，取消了凭证供应商品制度和物价管制，人可以自由流动，商品也可以自由流动了，自然资本也跟着流动。金钱带来效率，荣誉激发速度。

第八章 | 顶住围攻 / 139

1982年的日历刚翻开，南下的冷空气突然袭来，让“特区人”有点措手不及。谷牧第一次召集国务院特区组开会，讲了一番交心话：办经济特区的认识并不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你们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

叶剑英问谷牧：你顶得住吗？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第九章 | 题了，题了！ / 173

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央政府会选择如此遥远的、不出名的、既小又穷的边界地区作为其试验的经济特区？为什么这些边界地区更愿意做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最终为深圳写下了25个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第十章 | 当头棒喝 / 194

深圳人真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感觉，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香港学者陈文鸿专揭深圳“短”的文章给深圳人当头棒喝，一场围绕经济特区办得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由此展开。袁庚在蛇口进行超前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的试验。三位享有盛名的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有关“淘金者”的探讨引发了一场蔓延全国、波及海外的有关价值观的争论。最终，蛇口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口号之一。

第十一章 | 先锋调离 / 223

深圳在高速前行中踩了一下刹车，基建规模被大幅压缩，海南也因“汽车事件”，改革与发展受到重重一击。两位改革先锋先后离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深圳开始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并在探索发行特区货币中找到了自己更为恰当的位置。

第十二章 | 合理不合法 / 249

当初，经济特区就是不断地干着合理但不合法的事。正如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说的：“哪一项改革之初，不是离经叛道？”1987年，竟然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深圳人在思想观念上也是敢做敢当，首届比基尼健美大赛震撼着中国古老而又保守的大地，通过深圳这个窗口，中国人开始向世界表露对于美的追求。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也渐渐明白了一个朴实的道理：女人漂亮了，生活才美好。

第十三章 | 可怕的折腾 / 273

1988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又画了一个好大的圈——海南建立经济特区，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深圳经济特区的一百倍之多！但极端意识形态仍然不断地杀回马枪，给经济特区建设以重创，尤其是1989年发生的“洋浦风波”。正在快速开发的海南被狠狠地撞了一下腰，步子突然停了下来。

第十四章 | 政治王牌 / 298

如果说，1979年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么1990年的春天，同样这位老人在东海边也画了一个圈。改革开放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十五章 | 计划与市场之争 / 313

1990年，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朱镕基没有犹豫，一锤定音：“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上海浦东开发启动和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回应了邓小平的要求：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第十六章 | 云开雾散 / 342

上海“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发表之后，政界反应强烈，纷纷打听“发表背景”。舆论围攻也开始，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冷风吹袭。最终，邓小平去了南方，发表了“南方谈话”。云开雾散，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目标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春天的故事由此进入了高潮。

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1992年说的振聋发聩的话，有些其实在一年前的上海说过。

第十七章 | 惊险的一跃 / 373

如潮水般涌来的市场经济,也带来了黑市、走私、洗钱等现象,股市上的疯狂、楼市上的泡沫,一时也为人非议,给“特区人”上了一堂代价高昂的市场经济课。而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那段话也常常为人引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何尝不是惊险的一跃?其间,何尝不摔伤甚至摔死了那些疯狂者?

第十八章 | 被谁抛弃 / 403

中国走进 WTO 大家庭后,经济特区还“特”吗?疑惑多了,就有人出来问责了。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引发争论。蛇口作为“试管”已经破裂,徒具中国经济改革“图腾”的意味。海南在一段时期内左右摇晃,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深圳人咬住“转型升级”不放松有了成果,从“三天一层楼”到一天 46 件发明专利,从“杀出一条血路”到闯出一条创新路,再次为中国转型升级探路。

第十九章 | 从火车头到动车组 / 429

很多人在谈论经济特区时,往往想到的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其实经济特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几乎囊括了世界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区域的所有形式。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如果说最早的 5 个经济特区似火车头拉动了中国经济,那么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各种特殊形式的经济区域如动车组,使列车跑得又快又稳。

第二十章 | 一根红线 / 457

从 2013 年起,位于上海浦东东部那块 28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寄予厚望,希望成为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以支点撬动整体的改革开放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之一。从深圳经济特区到上海自贸区,中国人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不断地在特定区域进行制度试验。无论第一季,还是第二季,这是改革开放的一项大战略,似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

没有人比文治祥更深切地体会到黎明前那种黑暗的压抑。

那是1978年4月的一个夜晚，厚厚的乌云遮住了月光和繁星，漆黑不见五指。在中国广东宝安县深圳湾海面上，两条小船悄悄驶向香港，船上挤着六七名衣衫褴褛、面呈菜色的偷渡者。但很快，小船被广东边防部队截获，经查他们是宝安县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社员，让边防部队吃惊的是放走这些偷渡者的竟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文治祥。

“逃港”罪同“叛国”，文治祥因此蹲了四年大牢。

文治祥是南宋名臣文天祥亲弟弟的后裔。文天祥，南宋科举状元，因起兵勤王抗元，在今广东海丰被俘，面对生死，面对零丁洋（即伶仃洋），文状元写了《过零丁洋》诗以明志，于1283年1月9日从容就义。

那是一首诗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其最后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传诵。文天祥也就成为中国家喻户晓、孺妇皆知的传奇人物。

700年后，文治祥也做出两个选择：让一双儿女逃往香港，让他们过好日子，自己则留守家乡。

历史有时候有着惊人的轮回。

这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命运开始大转弯了，沉沉的国门正在慢慢地打开。可惜，文治祥比时代仅仅快走了几步。

出狱后的文治祥，终日守着一望无际的海水，郁郁寡欢。四年后，患肝癌去世。黎明前夜，却也不乏光明的探索者。

1978年12月26日，袁庚正笔挺地站在交通艇上，驶向深圳南头半岛，他率领部下到宝安县为建工业区选址。

远处跃入眼帘的是乱石、海滩，连绵荒山，不见人影，只有几只海鸟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海浪周而复始地洗刷着海滩。

这位新任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已经感受到“大地微微暖气吹”了。在冰雪寒冬的北京，一个扭转乾坤的会议刚刚结束。

但此刻，他在军用望远镜中看到的仍然是让人伤感的荒凉景色。

快艇驶入了大名鼎鼎的伶仃洋，袁庚熟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他还知道，鸦片战争的第一声炮，就是英国炮舰轰向对面的古炮台。尔后，伶仃洋面上侵略者的利炮坚船耀武扬威。

袁庚想到这些激动了起来，血脉偾张！

快艇快速地向向前，忽然，海面上浮现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有人告诉他那是偷渡者的尸体，身上套着轮胎，他内心泛起了恶心。

还有人告诉他，海浪常常将偷渡者尸体冲上沙滩。还有人说，他的家乡有“鬼村”，整个村子的人都逃亡香港了，除了游荡的野狗。

袁庚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1949年，32岁的袁庚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兵团长，带领部队进入宝安县以及珠江口的伶仃岛、大铲岛、三门岛，老百姓敲锣打鼓地迎接解放军，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那时是何等自豪。

可如今百姓却要逃往香港？！袁庚默默地凝视着远方的半岛，心潮起伏。

起风了，万顷波涛怒吼着向半岛扑去，似要将它吞噬。

这个荒凉的半岛就是蛇口，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名。

第一章 | “大逃港”

—

1984年6月30日,时为中国政局的掌舵人邓小平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大白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①

今天理解这句名言的内涵不难,但理解这句名言的背景并不容易。为什么邓小平要说这样一句话,并在日后反复强调?

1979年5月6日,发生在中国南方边陲小镇的“大逃港”事件是理解这一背景最生动、鲜活的故事。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偷渡逃港始终是一个让国人羞辱的话题,令人心酸。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全境解放,人们敲锣打鼓,扶老携幼欢迎解放军。深圳镇长陈虹激动地说:“深圳人民数十年来在国民党铁蹄下过的是苦难生活,每一个人都在期望早日得到光明。……深圳新生了,我们要在政府领导之下,建设新的深圳。”

次日出版的香港《大公报》这样描述:“深圳已卷在狂欢的气氛中。”^②

确实,结束了百年来的战争、动乱,中国人极度渴望和平的新生活。

可是没有多久,守卫边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现许多老百姓却要离开新生的深圳,逃向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51年1月21日,深港两地同时封锁边界,边界线上每50米建起一个8米高的岗亭。可是再严密的封锁也阻挡不住一波又一波的“逃港潮”。在此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里,深圳边境出现过四次大规模偷渡。

深圳的“圳”字是指“田边的水沟”,深圳顾名思义有水深的意思,广东人有以水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深圳市档案馆编:《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一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为财的说法，有水就有财。据说，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下发将宝安县升格为市的通知，在市委常委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撤县改市后是叫宝安市还是叫深圳市，最后确定叫深圳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深圳带水。^①

但是那时的深圳，有水却没财！

对于广东地方领导来说，偷渡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偷渡。

1977年11月17日下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到广州南湖宾馆，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的工作。

广东省领导人向邓小平汇报了广东所面临的难题：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一个叫深圳的边境小镇，一波又一波的偷渡让地方领导和边防部队苦于应付。

汇报者一脸严肃地叹息：宝安人逃港，连命都不要了，当地干部管不住，公安管不住，连边防部队也没有办法。

邓小平打断对方的话，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话让与会者震惊，不解地望着邓小平那深邃的目光，沉默了片刻，邓小平又补充道：“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时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波在一边听得清清楚楚。^②

在场的都明白，偷渡的根本原因是两地贫富差距太大了。

1979年，宝安县领导带队下去调查，得到的数据让人无颜面对“社会主义好”：

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多元港币（折合人民币4300多元），两者差距悬殊！^③

这边穷，比不过香港，作为广东人刘波自然多少也知道一点，但是5年后，他去深圳的梧桐山，亲眼见到的场景让他震惊：山上不时可见到偷渡者的尸骨和骷髅！刘波长叹道：“广东再也找不出更荒凉的地方了！”

但那时没有谁敢怀疑政策上有问题。尤其是地方上的领导，如果说政策有问

① 习近平：《远去的岁月，不会远去的背影——悼念张勋甫叔叔》，载《深圳特区报》2017年1月12日。

② 董滨、高小林：《突破：中国特区启示录》，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载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如果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听完汇报,邓小平离开广州,但留下了谜。

后来,广东的党史学者研究后发现:这次邓小平来,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汇报之后发表了谈话,谈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策问题。他反复说到政策是关键,而且一再强调,政策不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不了。比如在讲到农民养一口猪,需要奖励多少粮食的问题。他说,这个就是政策问题嘛,应该交给农民来讨论。……他还说逃港也是个政策问题,不是军队能不能管得了的问题。他谈的这些政策问题,跟此后他所谈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等,是一脉相承的。^①

其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在深深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的政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同年,在安徽,刚刚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走访了农村后,也为中国农民如此贫穷而感到难过。

他来到了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在县内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拖儿带女的农民们乞讨外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寒风中冻得哆嗦。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还不以为然地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习惯。”

万里听了动怒了,用手敲打着桌子,高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②

那时,能够公开指责中央的政策有误,同样让人震惊。

作家张宏杰在解释安徽凤阳穷和尚、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造反的原因时写道:“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这个判断也许离我

① 《1977年邓小平的绝密广东之行》,载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解密档案》栏目编:《解密档案:广东30年闯关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 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

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①

二

那时，“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词组。尤其是到了60年代，整个社会对于资本主义有了一种恐慌症。因为“小生产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那么单干户、个体贩卖、包产到户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集市贸易、讲求利润、自主经营也属于“资本主义”。

比如当年在中国农村，农民养几只鸡，自留地里种一些菜到市场去卖，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给予没收或处罚。在山区，让土特产烂在山里是社会主义，让农民运进城里去销售是资本主义。更荒唐的是在广东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②

那时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在1955—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小农经济还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还要继续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荒唐的“资本主义的尾巴”的理论达到顶峰。

曾有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老头，到深圳中英街对面中方辖区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老头得意地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这下子让革命群众警惕起来，把他抓起来，大会批斗。有人怒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老头老实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话音刚落，全场大笑。^③

①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③ 李翔：《共和国记忆60年地标》，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荒谬在笑声中，但荒谬也在人们内心深处，人们说话行事时总是有着一根警戒线——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三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江西是中共革命根据地。1933年，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他被下派到乐安县，之后又指定他到宁都的一个叫七里村的地方监督劳动。那是一个贫困山村，年轻的邓小平开荒种地，但总是吃不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危秀英，中央红军中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她在《女英自述》一书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①

而在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则有这样的记载：“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②

30多年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发配”到江西。还好，在狂热的政治喧嚣中，邓小平远离政治中心，有了片刻的安宁。

在那里，65岁的邓小平，拖地板、生炉子、做饭，还要照顾瘫痪的大儿子。他每

① 黄少群：《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下）》，载《百年潮》2004年第7期。

② 这是1984年3月5日，八一电影厂的编剧王愿坚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讲述的故事。载[美]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天与妻子一起往返于一条3里长的小路上下班，风雨无阻，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真切和直感地体会到了中国最底层人们的苦难生活，开始有了充裕的时间思考中国的贫穷问题。

女儿邓榕来看父亲，告诉他：“我们插队的陕北，穷的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20年了，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安塞、米脂一带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天一到就没粮了，国家每年都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现在是‘天下大乱’，谁还管什么生产的呀，不让人饿死已经很不错了。”^①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或许他又想起了当年“吃不饱，肚子好饿”的痛苦感受？

时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车间主任的陶端缙回忆，1971年6月，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到了江西，为了让瘫痪在床的邓朴方解闷，有一天，邓小平问他家里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可以让学物理出身的高材生邓朴方帮助修理一下。

陶端缙面有难色地告诉邓小平：“不瞒你说，我一个月四五十块钱的收入，要供养四个小孩，有的在上学，家里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有闲钱买收音机啊。”邓小平听后沉默了，久久不发一言。^②

邓小平习惯散步，在散步中思考。每天黄昏时分，在江西南昌步校的那栋灰色的小楼院子里，邓小平一圈圈地走着，夕阳将他的身影投在大地上，就像他脑中思索着的一个个问号和惊叹号，带着问号和惊叹号的思考沉重而深邃，穿透了历史和理论。

邓榕常常看到这一场景，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描述道：“他的步伐很稳，而且很快。他虽仍旧是那样地不言不语，但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③

邓小平妻子卓琳说，通过三年的观察，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于他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④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余孝忠、陈春园：《改革开放30年：从“小平小道”到改革开放大道》，载《经济参考报》2008年12月18日。

③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④ 钟新：《“小平小道”陈列馆正式开放》，载《深圳特区报》2008年12月19日。

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教授认为：“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性质以及如何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一九七七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要进行的改革大方向。”^①

愤怒出诗人，危难出真知，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有这样的说法：“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而司马迁自己也正是遭受宫刑后，含垢忍辱发奋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邓小平本人也不否认是“文化大革命”促使他进行深深的反思。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在北京中南海采访了邓小平。《60分钟》是一档著名的访谈节目，迈克·华莱士曾经采访过世界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和各界名流，并以其辛辣、强硬的主持风格和近乎于“审讯”的采访方式被观众所熟知。

华莱士问：“邓主任刚才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您和您家人的遭遇如何？”

邓小平回答：“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就是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②

可以说，“文革”最终彻底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借用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中的说法，“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③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怎样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迅速走上现代化通衢大道，成为邓小平复出后所面临

①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②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